

ZHENGZHI-JINGJI GUANXILUN

政治—经济 关系论

◎ 何建华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NGZHI-JINGJI GUANXILUN

政治—经济 关系论

◎ 何建华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政治—经济关系论/何建华著.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 10

ISBN 7-213-02698-4

I. 政... II. 何... III.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 IV. F0—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9083 号

政治—经济关系论

何建华 著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
激光照排 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大众美术印刷厂
(杭州市拱康路)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0.75 插 页 2
字 数 27 万
版 次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13-02698-4
定 价 2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言

站在理论研究的制高点上

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一个基本问题，但是，在当今的政治哲学著作中，专门研究政治与经济关系问题，却是为数不多的。何建华博士的著作《政治—经济关系论》，对这个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独辟蹊径，挖掘很深，提出的问题和所作的理论概括，令人耳目一新；特别应该说明的是，本书的理论阐述以深厚的历史经验为基础，所以，结合现实的实践进行认真品味时，是发人深思的。还要指出的是，本书语言生动活泼，作者善于深入浅出地阐述那些看起来很一般的理论问题，因而使读者从书名上看去可能是一些很枯燥的问题，读起来却能引人入胜。

《政治—经济关系论》一书中所研究的问题，初看起来似乎是常识性的，但是，它本身所包含的深刻理论内容，无论对历史来说还是在现实社会中，都是具有挑战性质的。历史的发展常常反映出一种奇特性质，即人们几乎经常面临史无前例的任务，但是，他们在完成这种新任务过程中所需要解决的理论课题，却往往又是相当古老的。经济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就具有这样的特点。这个问题的挑战性质在于，它是我们要完成新任务过程中所无法回避的老问题；它的确是人们司空见惯的普通问题，但又具有非常尖锐的思想性；它是人们认为已经解决了的理论常识，但是，人们却常常在这些常识性问题上产生重大失误；它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但是，就现实生活的要求来说它又是当代理论研

究的一个制高点。所以，要深入开拓这样的思想领域，不但要有一种理论家的使命感，而且还必须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

经济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对于我们的大多数理论工作者来说的确是个马克思主义的常识性问题，但是，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它却是屡次引起政治波澜的重大理论课题。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1920年前后，列宁与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之间曾经进行过一次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就是关于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问题，用列宁当时的说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人们都知道，列宁对这个问题发表了一些精辟的见解。那么，苏联共产党是不是完全科学地解决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呢？应该承认，后来斯大林在政治上的重大失误，说明他们并没有正确解决这个问题，而且由于把列宁的结论进行绝对化的解释，导致了一个又一个的政治灾难。如果从深层次来研究苏联共产党解体的根源，我们将不难发现，在处理政治与经济关系问题上的理论失误，是他们一系列政治失误的直接原因之一。今天，我们回过头来思考一下苏联共产党解体的教训时，就会对这个问题有更深刻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正确解决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问题，在这方面不但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对此不断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贡献。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的教训也是很深刻的。建国后的一个时期，毛泽东曾经为正确解决这个问题而进行过艰苦的探索，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但是也出现了不少理论失误，以至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空前的政治灾难。“文化大革命”的深刻教训之一，就是由于毛泽东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左”倾思想而导致了政治大动乱。这其中，作为“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个“理论”的错误实质之一，是歪曲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个“理论”的影

响是很深很广的。这就是说，在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常识性问题上，我们曾经走过一段很长的弯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进行的拨乱反正，为清除包括“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两个凡是”等在内的一系列错误理论，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这里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重新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与经济之间关系的基本理论，从而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果断地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思想。现在看来，这似乎是一些不言而喻的事情，但是，正是由于正确解决了诸如政治与经济之间关系这样的基本理论问题，我们国家才一次又一次地掀起了历史前进的巨大波浪。

在我们跨入 21 世纪的今天，放眼望去，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国际形势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现代市场经济、科学技术和民主政治的浪潮，猛烈地冲击着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社会生活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以其不可阻挡的趋势在曲折中向前发展；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任务艰巨，形势复杂，任重道远。在这样的特殊情况下，就要求我们全党，特别是各级领导者，必须站得更高一些，看得更远一些，想得更深一些，非如此，我们是无法挑起这样的历史重担的。这就是说，我们必须继续提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不断拓宽理论视野，增强马克思主义的胆识。这里，就对我们的理论工作者提出了一个重要任务，即以创新的精神，站在理论研究的制高点上，深入研究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重大问题，把马克思主义推向新的历史阶段，使我们能够用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

宋惠昌 2003 年 10 月

目 录

序言 站在理论研究的制高点上	宋惠昌	(1)
导言 政治—经济的相互关系：一个凝重的话题		(1)
一、为什么要研究政治—经济的相互关系		(2)
二、经济和政治的内涵与本质		(10)
三、研究政治—经济相互关系的方法论		(15)

上篇 政治—经济关联结构的历史考察

第一章 政治—经济关联结构的传统模式	(22)
第一节 小农经济的制度化结晶	(23)
第二节 皇朝国家对经济的控驭	(33)
第三节 政治本位的父道型关联结构：特点及意义 ...	(46)
第二章 政治—经济对称结构的形成与现代化	
浪潮的兴起	(61)
第一节 从不对称走向基本对称：经济地位的提升 ...	(62)
第二节 从不对称走向基本对称：利益合理性的 伦理辩护	(70)
第三节 从不对称走向基本对称：理性经济 组织的形成	(76)
第四节 从不对称走向基本对称：限政的诉求	(88)
第三章 政治—经济对称结构的演变与社会主义	
现代化的曲折历程	(93)
第一节 经济的政治属性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	

结构的内在矛盾	(95)
第二节 政治的经济职能与国家统制经济体制的确立	
.....	(104)
第三节 经济问题的泛政治化和政治功能的无限扩大	
.....	(113)

中篇 政治—经济相互关系的理论分析

第四章 相对分离的政治和经济	(137)
第一节 领域分离的实现.....	(138)
第二节 领域分离的特征.....	(152)
第三节 领域分离的后果.....	(165)
第五章 交互作用的政治和经济	(178)
第一节 以经济为基础的交互作用.....	(180)
第二节 突出政治的交互作用.....	(196)
第三节 双向互动的政治和经济.....	(208)
第六章 何种政治与何种经济的关联	(220)
第一节 市场经济与社会秩序.....	(221)
第二节 经济财富和政治权力.....	(237)
第三节 经济发展和政治现代化.....	(261)

下篇 政治—经济关联结构的现实反思

第七章 政治—经济关联结构的当代重建	(286)
第一节 重建的道路选择：强政治—强经济双赢模式的确立.....	(287)
第二节 重建的现实困惑：政治和经济的弱势化.....	(310)
第三节 重建的基本途径：政治和经济的相对分化...	(323)

后记	(337)
-----------------	-------

导言

政治—经济的 相互关系：一个凝重的话题

人类总是在不断总结自己错误的基础上，实现向更高层次和更高阶段的跨越。那么，人类为什么会犯错误？这些错误又如何表现出来？人类如何能够克服前进道路上的错误？对这些问题的探索，促使人们不得不将自己的视野投向作为人类社会最基本元素的政治—经济的相互关系问题^①。社会主义社会作为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一种道路选择，它深刻批判了导致一系列灾难的资本主义模式，揭示了资本主义逻辑与现代化逻辑的内在矛盾，设计了一种新的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政治—经济的关联结构。但是，社会主义在苏联、中国等国家的现实展开过程中所建构的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高度控制、直接支配经济活动的体制，却滋生了严重的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在一些国家甚至导致了社会主义政权

^① 在这个问题上，古往今来的许多人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例如，在古希腊，梭伦通过“解负令”和限制贫富差距、扶持工商业发展的政策，通过确立以财富确定政治权利的制度，变革了传统的经济与政治的相互关系，使雅典城邦迎来了繁荣鼎盛的时期。再如，在中国历代开国皇朝那里，都实行了减免赋税徭役、鼓励农耕的经济政策。在政治上则重振纲纪，严整吏治，实行开明统治，变革了传统的经济和政治的相互关系，恢复并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巩固了新生政权。

的全面崩溃。政治权力、意识形态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决定性作用以及这种作用在强大与软弱之间的戏剧性转变，促使人们不得不去思考这样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会走向强化政治的道路？它们为什么不能把政治权力对经济活动的作用力度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和合理的程度上？在社会主义国家，如何界定和实现政治对经济的适度作用？社会主义逻辑和现代化逻辑之间是否存在内在的本质性的矛盾冲突？对这些问题的探索，再一次促使人们将自己的视野投向政治—经济的相互关系问题。

人类总结历史，正是为了面向未来。而向未来的推进，又依赖于对现实的深刻把握。现实的中国社会，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出现了经济政治化和政治经济化的发展趋势。那么，在信息化蓬勃发展、新经济初露端倪的今天，政治对经济的作用又如何界定？新经济对政治属性、政治运行、政治功能又提出了什么样的要求？应该如何建构政治—经济良性互动、内在统一的当代形态？

上述问题，要求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思考历史”，辩证地认识历史和现实的复杂性，具体揭示政治—经济关联结构的演进历史，科学探索两者良性互动、内在统一的当代形态，从而在自觉的实践中创造出历史必然性得以实现的具体形式。

一、为什么要研究政治—经济的相互关系

也许有人会说，经济和政治的相互关系问题，已经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难道它还有什么研究价值？再说，马克思恩格斯已经在理论上科学地揭示了两者的辩证关系^①，后人在这个问题

^①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政治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政治的性质由经济的性质说明，一切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应当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中，从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寻找；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又能够反作用于经济。

上难道还能超越他们？一句话，当前研究政治—经济的相互关系没有什么意义。那么，在当代中国是否有必要研究两者的关系问题呢？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有赖于我们对政治—经济相互关联的现状及其现实意义的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分析。那么，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相互关系问题上的理论和实践又能告诉我们什么呢？

首先，政治—经济的相互关系问题，是与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息息相关的。

1991年8月23日6点30分，继波兰、匈牙利、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等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令人震惊的变化之后，苏共中央大楼顶上的红旗飘然落地；4个月之后的12月25日19点32分，社会主义苏联的红色国旗缓缓降下。举世瞩目的苏联东欧巨变发生了，曾经在20世纪的大多数岁月中令西方资本主义望而生畏的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转眼间便不复存在。

现在，随着时间的逐渐推移，人们已经能够更加理智、更加完整地揭示这一悲剧的主要原因和历史意义了。在今天，人们已经得出一个基本共识，这就是：苏联东欧巨变，是与他们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不断强化政治、高度集权、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教条的意识形态密不可分的。在这一体制和观念主导下，社会生活中出现了严重的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政治权力高度垄断、直接控制、全面经营着社会的经济生活。而经济活动则缺乏现代化所要求的独立自主性，经济逻辑得不到应有的尊重，经济利益得不到应有的维护，根据政治的需要来决定生产多少、生产什么、如何生产、由谁来生产等基本的经济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经济主体的生产积极性就不能得到有效发挥，经济效率就不能成为生产者和管理者关心的话题。于是，伴随着政治的不断膨胀，经济开始逐渐萎缩起来，人民生活水平不能得到较快的提高。最终，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建设的逻辑也就同现代化的逻辑，尤其是同以信

息化为代表的现代化逻辑，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冲突。那么，曾经为人类带来巨大希望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何以会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出现如此深刻的矛盾冲突？人们又该如何去克服和消除这些矛盾冲突？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实质上也就是对政治—经济相互关系问题的反思。

为了消除上述矛盾，一些国家走上了改革的道路。但是由于在改革的道路或模式选择上，没有正确处理好政治—经济的相互关系问题，企求在经济体制、经济生活、经济效率没有发生重大改变的情况下，首先通过政治改革，来达到变革旧有体制、适应和促进现代化发展的目的。这样就引发了人们思想和社会生活的混乱，并进一步恶化了本来已经非常糟糕的经济形势。政治—经济相互关系问题上的旧矛盾还没有解决，体制性的缺陷尚没有克服，又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的不断累积、不断暴露，最终导致了苏联东欧的巨变。由此可见，政治—经济的相互关系问题，因为它成了合理解释苏联东欧巨变的主要理由，因此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

其次，政治—经济的相互关系问题，是与科学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教训密切相关的。

如何总结我们自己曾经犯过的错误，决定着我们前进的步伐。过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也强调要注意对经验教训的自我总结、自我消化、自我吸收和自我改进，但是，在许多问题上却经常性地出现恶性循环。例如，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就曾陷入了集权和分权的矛盾漩涡。这是为什么？我们究竟应该怎样总结才能走出一系列矛盾漩涡？

很显然，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离不开政治—经济相互关系这一视角。对此，邓小平曾有一系列明确的论述。在他看来，在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这些事只要有一定的

规章，放在下面，放在企业、事业、社会单位，让他们真正按民主集中制自行处理，本来可以很好办，但是统统拿到党政领导机关、拿到中央部门来，就很难办。谁也没有这样的神通，能够办这么繁重而生疏的事情”^①。这一现象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表现得最为明显，在经济体制上，实行“一大二公”和单一的所有制形式，农民养几头猪的自由也没有，所有的工厂、企业都归政府直接控制和经营。其结果是经济没搞好，政治本身也没有搞好。夸大政治的作用，其后果不是使政治发挥更大作用，而是连政治本来应当发挥的作用也没有发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过去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分过几次权，但每次都没有涉及到党同政治、经济组织、群众团体等等之间如何划分职权范围的问题”^②，从而陷入集权和分权的恶性循环之中。

各级领导机关，之所以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中国经济和政治生活中之所以会出现集权和分权的恶性循环，在很大程度上是同片面政治主导论密切相关的。1966年2月3日到4月5日，当时由林彪控制的《解放军报》陆续发表了7篇论述“突出政治”的社论。反复宣传“突出政治一通百通，冲击政治一冲百空”；“政治永远是第一，永远要突出。政治要在百分之百的时间里起作用”；“有了精神成果，就一定能出物质成果”；要“处处突出政治，事事突出政治，时时突出政治”。这些提法的实质是以政治代替经济、代替业务，是一种政治万能论和政治狂热。他们所理解的政治是一种片面的政治，具体表现为片面冲突政治论（把政治等同于阶级斗争，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认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片面权力政治论（把政治作为社会公共权力的性质引向极端，在实际生活中表现出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8页。

② 同上，第329页。

思想和工作作风)、片面策略政治论(把政治是一种艺术的观点加以曲解和误用,为了目的不择手段,视政治为玩弄权术和投机钻营)、片面总体政治论(把政治是统帅和大局的观点绝对化、片面化,相信政治可以包办一切,代替一切,陷入政治万能论的陷阱)、片面道德政治论(夸大政治的伦理道德属性和伦理道德意义,对政治作唯心主义的理解,不切实际地追求政治思想的纯洁性,强调“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导致了政治狂热。突出这种片面政治的后果就是:经济生活中的政治万能和政治狂热倾向严重,滋生出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形式主义和政治腐败。同时,大搞阶级斗争,停产闹革命,宣扬什么“不为错误路线生产”,“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对社会主义的经济生活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严重制约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基于这一认识,邓小平提出了以党政分开、政企分开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和经济效率的标准。在他看来,“今后,政治路线已经解决了,看一个经济部门的党委善不善于领导,领导得好不好,应该主要看这个经济部门实行了先进的管理方法没有,技术革新进行得怎么样,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多少,利润增长了多少,劳动者的个人收入和集体福利增加了多少。各条战线的各级党委的领导,也都要用类似这样的标准来衡量,这就是今后主要的政治。离开这个主要的内容,政治就变成空头政治,就离开了党和人民的最大利益”^①。从这里可以发现,政治—经济的相互关系问题,乃是邓小平科学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主要立足点。在今天,面对如何反思历史和现实等重大问题,我们仍然有必要像邓小平那样,善于从政治—经济相互关系的高度来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找准我们前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50页。

进的方向。

最后，政治—经济的相互关系问题，又是与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伴随始终的。

围绕改革开放而产生的所有重大问题，几乎都与政治—经济的关系问题密切相关。无论是改革目标的确立、改革时序的安排，还是改革道路的选择和改革方法的制订；无论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是政治体制改革；无论是农村改革还是城市改革，概莫能外。对政治—经济相互关系问题的正确解决，成为中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和取得现代化建设伟大成就的主要原因。但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使我们没有任何理由陶醉于我们在正确处理政治—经济相互关系问题上曾经取得的成果，正像我们在改革开放以前没有任何理由陶醉于马克思恩格斯已经取得的理论成果一样。这种陶醉，最终只能为日新月异的社会实践所抛弃。改革开放中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构成了我们持续不断进行改革的充分理由，也为我们提供了在理论上继续探讨两者相互关系问题的充足理由。那么，究竟是哪些问题使得两者的相互关系问题变得如此重要呢？

第一，如何科学认识自由主义、国家主义和威权主义等现代化理念？如何辩证地认识它们在政治—经济相互关系问题上所取得的成果？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实现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跨越的道路，一般都摆脱不了上述三种模式。这些国家在现代化道路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曾经而且现在仍震撼着地球上的绝大多数民族。那么，它们的发展模式呈现出何种特征？存在着什么样的缺陷？对于当代中国来说，这些模式又具有何种现实意义？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实际上也就是对政治—经济相互关系问题的深入探讨。这是确立社会主义逻辑和现代化逻辑内在统一结构的一个前提。

第二，如何看待片面政治主导论在当前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改

改革开放以来，片面政治主导论逐渐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失去了它曾经享有的荣耀，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是在克服和消除片面政治主导论的过程中取得一系列伟大成就的。但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这种论点、这种思维习惯、这种行为方式是否已经彻底绝迹了呢？客观地说，片面政治主导论在当前仍有一定的市场，发挥着一定的作用。所谓片面政治主导论，就是把片面化的政治当成整个社会生活，即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的决定性力量。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以阶级斗争为纲”意义上的政治早已被现代化的实践所抛弃，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种观点似乎并未绝迹，迄今仍有人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提出质疑和批判。国际国内形势稍有风吹草动，一些人就会重弹以“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为中心的论调；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政治万能论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对总体政治观的片面性理解，仍大有人在。一些人过分强调政治的宏观性、战略性意义，他们常常把一些工程项目、生产指标、生产日期等经济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把它们看成是“献礼工程”、“政治工程”，必须采取一切手段按时或提前完成。于是，为了这种所谓总体的政治利益，很容易牺牲经济效益率和工程质量。万一这项工程出了问题，也可以用“政治账”来加以掩饰和辩护；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人仍旧用抽象的片面的伦理和道德标准，来认识和评价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政治生活。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没有能够消除两极分化、没有能够实现社会正义和社会公平，因此是一个缺乏道德合理性的社会。与此相反，社会主义社会则是一个充满道德合理性的理想社会。我们还可以看到，片面权力政治观从根本上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克服。在一些人看来，权力可以代表一切，可以控制和决定一切，于是他们为追逐权力而不择手段。他们信奉“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信条，于是在他们掌权的地方，政治权力不仅可以随心所欲地决定干部升迁提拔，而且可以随心所欲地作用于经济活动和经济领

域。如何认识这些现象，又如何克服这些消极现象，无不有赖于政治—经济相互关系的正确处置。

第三，如何正确认识和合理解决当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性问题？在目前，绝大多数的人认为，与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相比，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却相对滞后。这种不平衡的发展，既可以表现为在经济活动中过度强化政治权力，导致党政不分、政企不分、政治权力随心所欲甚至是非法干预和介入经济活动、腐败行为猖獗（“经济要上，廉政要让”，“先发展经济后反腐败”）等弊端；也可以表现为在经济活动中过度弱化政治权力。有人认为，市场经济作为现代化的共同趋向，只是一种经济制度或经济现象，和政治没有关系。有人甚至认为政府不必管了，在经济活动中为所欲为，就是市场经济，或者大家都去赚钱，一切向钱看，党政干部也“下海”，就是市场经济。由此出现了中央权威的流失（放弃对政治体系的调控职能，产生了政治规范真空和市场规范真空并存的局面，导致社会和经济的无序状态）、政府整合能力的削弱、地方主义抬头等消极现象。政治权力的过度弱化，还可以表现为社会生活中的非政治化和反政治化倾向。改革开放后，有人矫枉过正，认为当前的政治问题就是如何实现经济增长，于是一些地方和一些人开始不择手段地追求经济利润，导致假冒伪劣、走私贩私、行贿受贿、色情招揽等现象屡禁不止。有些人对现实的政治生活失去信心，产生了非政治化和反政治化的思想观念。

上述问题表明，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存在着结构失调和功能障碍，它不仅不利于社会协调发展和全面进步，而且加大了经济增长的成本，阻滞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因此，如何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确立适应并推进市场经济发展的政治体制、政治观念、权力运行机制，使社会主义政治适应并推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乃是当代中国政治实践的一个重大课题。

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生活中面临的一系列问题，构成了